

赵炳林◎著

东北地区 古代民族政权研究

DONGBEI DIQU GUDAI MINZU ZHENGQUAN YANJIU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资助出版

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研究所资助出版



赵炳林 ◎ 著

东北地区 古代民族政权研究

DONGBEI DIQU GUDAI MINZU ZHENGQUAN YANJIU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北地区古代民族政权研究 / 赵炳林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5668 - 0805 - 9

I. ①东… II. ①赵… III. ①古代民族—政权—史料—研究 东北地区
IV. ①K28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0911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铨建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广州市怡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 36.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前言

东北民族政权是指历史上曾经存在于中国东北地区的政权，包括箕氏、卫氏、高句丽和震国等四大政权。另外，还有一个被朝韩学术界认为是真实存在，但实为神话传说的桓檀政权。

笔者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古代资料，对相关问题进行再探讨，以期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的真面目。本书分五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关于桓檀政权的讨论。桓檀政权是朝鲜传说中的一个政权，其面世的时间相当于中国元朝时期。当时，朝鲜正遭受元朝的威胁，面临国破危险。作为最早记述桓檀神话的史书《桓檀古纪》，其实是相当于中国元朝时期的高丽人所写的东西，且由众人作品拼凑而成，并不是成于远古的古籍。所以，桓檀政权是处于民族危机中的高丽人为了唤醒民族自觉而编造的建国神话。

第二部分是讨论箕氏朝鲜。箕子是商末遗民，在周武王灭商后，东走古朝鲜之地，建立政权。该部分对箕子去周、来周时间，周武王会见箕子的地点，箕子与周朝的关系，箕子朝鲜的疆域范围，箕子政权的存续时间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箕子东走的时间为周武王十一年，来周时间为周武王十三年，即周灭商后的第二年。周武王见箕子于管地，而非成周。对于箕子朝鲜对周朝的态度是臣，还是不臣，是接受了周朝的分封，还是拒绝了周朝的分封，笔者认为，“封而不受”可能最接近历史的实际。箕子朝鲜建国的时间不早于周灭商的那年，即周武王十一年（前1052），灭亡时间为汉高祖十三年（前194），前后存续857年。箕子朝鲜的东部包括现在的俄罗斯滨海地区、朝鲜的两江道、咸镜南北道、江原道和中国吉林的延吉地区，西部包括平安南道、黄海南北道的北部地区，东西到海，南与辰国相接。

第三部分主要讨论卫氏朝鲜。卫氏朝鲜是燕人卫满在朝鲜半岛建立的政权。该部分对卫满的族属，卫氏朝鲜灭亡的时间、疆域，卫氏朝鲜与西汉王朝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卫氏朝鲜的建立者卫满是汉人血统，而非秽貊人。卫满建立政权的时间应在孝惠、高后之间的某一年。其疆域在半岛西部，大概以灭恶山脉为界，往东到江原道的箕山里，然后越过马息岭，最后往东至海。这是其南界。其北界为湫水之南，并狼林山脉分水岭以东之地一线。关于卫氏朝鲜和西汉的关系，不能断然否认其对西汉政权的归属，

但也不能过分拔高二者的关系。两国的关系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两国间的战争是分裂和反分裂的战争。

第四部分主要讨论高句丽。高句丽是源出于夫余的朱蒙建立的政权。该部分的探讨主要集中在高句丽的得名、族源、民族构成、灭亡后的人口去向、领土取向、疆域变迁、高句丽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及中外史书对高句丽政权归属问题的记载等方面。本书认为，“句骊”之名是朱蒙南下后，用自己的族名取代原名“夫余”后的称呼，虽然字型有变，但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稿离、高离、高夷的读音，然后在其前加一个“高”字，形成了高句丽的族名和国家名称。貊族是高句丽的主体民族，也是高句丽的唯一族源。作为一个民族的共同体，高句丽主要包括句骊、貊、秽、夫余、沸流、沃沮、荇、古朝鲜、汉、百济、新罗、契丹、突厥、肃慎、倭等族。高句丽在总章元年（688）被唐朝灭亡后，其人口流向了唐朝、新罗、突厥、契丹、日本等国，还有一部分在战后被唐朝和新罗军队杀掉。其领土也被新罗、唐朝、震国等国家所瓜分。高句丽的疆域有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总体来说，西部到了辽河，甚至辽河以西的地区，向东达于大海，向北到了今东流松花江地区，向南到了汉江，甚至更南的庆尚南道地区。高句丽建立后，为了能够在东北亚的国际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纵横捭阖，或吞并，或蚕食，或斗争，或称臣，使其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存续了七百余年。对于高句丽政权的归属问题，中朝史书多有记载。总体来说，可以以《晋书》为界，分为两个时期。之前，中原王朝主要还是把高句丽作为境内少数民族政权来看待；之后，开始把它和百济、新罗、倭等国相提并论；从新旧《五代史》开始，明确把高句丽作为《外国传》和《四夷传》中的域外政权来看待了。这个变化过程反映了高句丽从中国地方政权向独立的域外政权发展的轨迹，也反映了中国历代王朝和高句丽政权的斗争过程。

第五部分主要讨论震国。震国是大祚荣背唐建立的政权。这一部分主要对民族学术语“别种”的概念界定，震国的族称、国号，震国的归属问题，震国的疆域，震国灭亡后的领土去向、人口去向及震国的外交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别种”一词有“分出去的种”和“不同的种”两种含义。勿吉、靺鞨和靺鞨三者之间不存在前后相继的关系，“靺鞨”是族称，而非国号；“震国”是国号，而非俗称；“渤海”是族称，而非国号。渤海非高句丽种，大祚荣是粟末靺鞨人。震国经过大祚荣时期的奠基、大武艺的“斥大土宇”、大仁秀的“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到大玄锡时，终于成为“海东盛国”。震国被辽朝灭亡后，其领土被辽朝、女真、高丽所据，还有一些

被境内的割据者所占。人口主要流向辽朝，还有部分流向高丽。为了获得生存和发展，震国对突厥先傍结后背离，对新罗先事后侵，对唐朝貌恭而心不恪，对日本既事大，又抗争。这些都反映了震国事大政策的实质，即功利性、脆弱性、多向度性和表里不一性。

目 录

前 言	1
绪 论	1
选题缘由及其意义	1
本论题的相关研究状况	3
基本概念的界定	27
第一章 古朝鲜的历史沿革	29
第一节 檀君神话及其相关问题	29
一、一然《三国遗事》对檀君的记载及对“朝鲜” 地名的考释	29
二、《桓檀古记》的成书年代和内容	31
三、一然及其《三国遗事》	33
四、檀君朝鲜是神话传说	34
五、国际关系中檀君的际遇变化	36
第二节 箕氏朝鲜及相关问题	37
一、箕子及其相关问题考证	37
二、箕氏朝鲜相关问题考证	42
第三节 卫氏朝鲜及其相关问题	49
一、卫氏及卫氏朝鲜的兴亡	49
二、卫氏朝鲜的疆域以及与西汉的关系	57
第二章 高句丽政权及相关问题	65
第一节 “高句丽”的得名及其族源	65
一、“高句丽”的得名	65
二、高句丽的族源	68
第二节 高句丽的民族构成	72
第三节 高句丽的疆域变迁	80
一、高句丽建国前后的大体范围及其归属	80

二、高句丽的东、西疆界·····	83
三、高句丽北部疆界的变迁·····	87
四、高句丽南部疆界的变迁·····	90
第四节 东亚格局中的高句丽·····	97
一、建国之初高句丽的对外关系·····	97
二、高句丽王朝中期的对外关系·····	102
三、高句丽王朝后期的对外关系·····	117
第五节 中国古代史书对高句丽归属问题的记载·····	122
一、中国正史对高句丽归属问题的记载及其所表达的思想·····	122
二、从高句丽史在中国正史中的地位看其归属问题·····	130
第六节 高句丽灭亡后的领土去向·····	134
一、被新罗占据的高句丽领土·····	134
二、被唐朝占据的高句丽领土·····	139
三、被渤海占据的高句丽领土·····	144
第七节 高句丽灭亡后的人口去向·····	146
一、高句丽灭亡时的总人数·····	146
二、高句丽灭亡后的人口流布·····	148
2	
第三章 震国政权及相关问题·····	157
第一节 “别种”——一个关键的概念·····	157
一、辞书对“别种”的解释·····	158
二、“别种”在生物学史料中的含义·····	158
三、“别种”在民族学史料中的含义·····	159
第二节 大祚荣政权的族称和国号问题·····	171
一、“勿吉”、“靺鞨”、“靺鞨”三者之间不存在前后相继的关系·····	172
二、“勿吉”和“靺鞨”是北朝统治者对“靺鞨”的蔑称·····	175
三、“靺鞨”是族称，而非国号·····	176
四、“震国”是国号，而非俗称·····	178
五、“渤海”是族称，而非国号·····	180
第三节 震国的归属问题·····	182

一、中外学者在震国归属问题上的分歧	182
二、史书对“震国”及其建立者大祚荣族属的记载	183
三、渤海非高句丽种，大祚荣是粟末靺鞨人	184
第四节 震国的疆域	187
一、大祚荣的奠基时期	187
二、大武艺的“斥大土宇”与大钦茂的向南发展	190
三、宣王大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	194
四、大玄锡时期“海东盛国”局面的形成	195
第五节 东北亚格局中的震国	197
一、对突厥先傍结后背离	198
二、对新罗先事后侵	199
三、对唐朝貌恭而心不恪	201
四、对日本既事大又抗争	210
五、震国“事大”政策的实质	215
第六节 震国灭亡后的领土去向	216
一、被辽国占据的领土	217
二、被女真占据的领土	225
三、震国境内的割据者	233
四、被高丽占据的震国领土	234
第七节 震国灭亡后的人口去向	235
一、流入辽国	236
二、流入高丽的震国人	243
结 语	245
参考文献	248
后 记	264

绪 论

选题缘由及其意义

选题缘由

东北民族政权研究是当下中外学术界，尤其是东北亚各国十分关注的论题，因而是一个热点问题。从历史上看，东北诸民族政权的归属问题似乎很明确，争论也不大。就连高丽的历史学家金富轼也认为箕氏朝鲜和卫氏朝鲜是归属于中国的地方政权，他说：“海东有国家久矣，自箕子受封于周室，卫满僭号于汉初。”^①但是近年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中外学术界开始在其历史认同、政权归属、领土范围等方面出现了严重分歧。生长于西北的笔者向来比较关注边疆问题，对边疆地区的国际关系甚感兴趣。东北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笔者对之了解甚少，总感觉是一种缺憾。而且，在硕士阶段，笔者主要研究西北史。在此过程中，笔者发现自己的知识缺乏系统性，对北方各民族之间内在联系的了解很模糊，所以想拓宽民族史的研究范围。这是笔者将此论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主观原因。还有一个偶然因素使我选择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那就是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在南京大学资助进行有关韩国史的相关研究。导师李昌宪教授和南京大学韩国研究所所长刘迎胜教授也同意笔者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就这样，笔者从西北史研究转到东北史研究上来了。这个选择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要研究一个地方的历史，首先要对那里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有一个大致了解，而东北史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为了把这个“烫手山芋”做好，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去了解那里的风土人物和相关研究成果。在广泛而深入地熟悉相关史料和学术界研究状况之后，笔者决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东北民族政权继续进行探讨，以期得出比较公允的结论。

^① [朝] 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注：《三国史记》卷29，《年表上》，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页。

目前中外学术界对东北民族政权归属的研究，其观点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有两种。韩国、朝鲜、日本等国的部分学者为一派，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檀君是朝鲜民族的始祖，檀君朝鲜是存在的；卫氏朝鲜的建立者卫满不是汉人，而是朝鲜民族系统的人；高句丽、震国（多数学者称为渤海国）是独立于中国历代王朝之外的政权；震国是高句丽的继承国，其建立者大祚荣是高句丽人；震国和新罗为朝鲜的北朝和南朝；王氏高丽是高句丽的继承国。而大多数中国学者则认为檀君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檀君朝鲜也是虚构的历史神话，不是信史；卫氏朝鲜是燕人卫满建立的政权，在政权上归属于汉朝；高句丽和渤海国都是由中国人建立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和王氏高丽在民族成分等方面是不同的，不能算是继承关系；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高句丽在灭亡后，就从历史上消失了；震国的建立者大祚荣是粟末靺鞨人，而不是高句丽人。到底孰对孰错？由于资料的限制和对概念理解的不同，这两种观点在很多方面都没有达成共识，基本上是各持己见，所以这个领域还有继续拓展和研究的空间。这也是我选择这个选题的重要原因。

选题意义

2

东北地区是中国的边疆地区，和朝鲜、俄罗斯相邻，与日本隔海相望，也与朝鲜半岛南部的韩国距离很近，而这些相邻近的国家也都是东北亚的重要国家。这是它们之间的地缘关系。在历史上，这一地区因政权嬗替、领土变迁、人口迁移、战争等原因，存在着纠缠不清的历史情结和民族问题。也因地缘、血缘、民族、历史等因素的存在，使相关研究非常复杂和棘手。

在这种情况下，就东北民族政权进行研究，不但对学术发展有好处，而且对弥合各方分歧大有裨益。但现实情况是，中外在东北民族政权归属问题上的分歧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如果任凭这种情势发展下去，无疑会由学术分歧上升到外交纠纷和国家矛盾。对此，我们应该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复杂的。最关键的一点是，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受政治的影响比较大，甚至可以说，政治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中外学术界在这方面的分歧。笔者认为，研究政权问题，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历史的眼光和宽容大度的心态，而不应该站在现在的角度去人为规定古代的事情。今天的中朝疆域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而不是在古朝鲜、高句丽、震国时期就已经定型了的。（即使这些政权的疆域也有一个变迁沿革的过程，为什么非要抓住不放呢？）如果任何一个国家都用最古时期或历史上某一时段的疆域作为标准而提出领土问题的话，

那只会徒增混乱和矛盾，而不会有利于事情本身的解决和国际关系的稳定。

所以，对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东北诸民族政权进行研究，不但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政治现实意义。研究这个问题，对正确认识历史时期东北诸民族政权的历史、解决学术争端、化解国际矛盾都有现实意义。

本论题的相关研究状况

本书主要探讨历史时期曾经存在过的檀君朝鲜（实为神话传说，由于行文需要，姑且看作一个阶段）、箕氏朝鲜、卫氏朝鲜、高句丽和震国五个政权。在分别叙述东北诸民族政权研究的现状之前，先介绍两篇综述性文章：其一为李德山《东北边疆和朝鲜半岛古代国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4期），这篇文章是关于东北边疆历史研究回顾与展望的笔谈专稿，其对中国东北边疆古代国族的研究、朝鲜半岛古代国族的研究状况作了概述，同时也提出了今后研究中应该重视的几个问题。其二为刁书仁《中朝边界沿革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4期），其对中朝边界沿革史研究的历程作了回顾，分为20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50年代至70年代，80年代至今；也对学术界有代表性的观点和存在的争议作了说明；对中朝边界史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这些建议对今后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他所提出的问题也是比较客观和公允的。

3

檀君被写入朝鲜历史，始于《桓檀古记》，然后被高丽时代的一然和尚所编撰的《三国遗事》所征引。之后，檀君才在一些史书中有零星记载。对檀君，起初韩国学术界承认，但朝鲜否认。直到1993年10月朝鲜考古界自称发现了檀君墓^①。至此，檀君朝鲜在朝鲜、韩国才都得到了承认，并被作为创国之君来看待。但在中国学术界，学者一致认为它是朝鲜史上的传说时代，不能算作信史。在檀君研究方面，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着眼点主要不在于归属方面，而在于桓檀神话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多方面。杨万娟《韩国文化与中国楚文化渊源初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认为檀君神话是在古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才出现的。秦朝末年逃往半岛的方士韩终可能就是檀君神话中桓雄的原型。新罗以熟练使用汉字的优势创造并记录下开国神话，神话中融入了大量的楚文化色彩。半岛学者金得槐《白头山与北方疆界——鸭绿江、图们江不是我们的国境》（《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动态》

^① 张珺瑰：《檀君与政治》，《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年第3期。

1999年第1期)不但认为檀君真有其人,而且把其诞生之地长白山说成了朝鲜民族的圣山,是朝鲜民族政治文化的发祥地和民族史之根。李春华著,雷子金译《〈春香传〉:朝鲜民族深层文化意识的再现》(《延边大学学报》1999年第8期)把檀君神话和朝鲜民族中的烈女春香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二者正反映了朝鲜民族的深层精神文化,即现实意识、德治意识和向上意识。在该文中作者把檀君作为神话来看待,而神话“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①。徐东日在《朝鲜古典说话:朝鲜民族的文化意识》(《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中认为,“檀君神话充溢着一种人本主义的思想情愫,它与其说是一个神话,倒不如说成是一则传说”。张碧波《长白山与太伯山考论》(《满语研究》2002年第2期)否认檀君及其檀君朝鲜的存在,他也认为其为神话,并非信史。张碧波《对古朝鲜文化的几点思考》(《北方论丛》1998年第1期)也表达了基本一致的立场。傅朗云《朝鲜民族族源神话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5年第2期)中说“檀君神话的时间包括唐尧即位五十年庚寅到周武王即位乙卯年的约两千年时间”。他也认为“周武王东封箕子于朝鲜,可能也囚禁了最后一位檀君”。傅先生的态度有些不明朗,一方面说檀君是神话,另一方面又说实有其人。苑利《朝鲜族熊虎同穴神话源出北方羌族考——兼论中国彝语支民族熊虎图腾崇拜的北来问题》(《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对檀君前朝鲜族熊虎崇拜的起源问题作了深入探讨。他认为,朝鲜的熊虎崇拜和西南彝族的熊虎崇拜,都有一个共同的更为古老的文化源头,即更加古老的羌文化。张珽瑰《檀君与政治》(《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年第3期)通过对700年来檀君在不同历史时期际遇的考察,总结和探索了关于檀君论争本身的意义。他指出,檀君枯荣变迁不是反映了檀君史,而是反映了朝鲜的政治社会史。另外,许辉勋《对朝鲜民族文化心理本原的神话学阐释》(《延边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刘子敏《从新罗建国神话传说看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影响》(《东疆学刊》2001年第1期)、陈蒲清《古朝鲜族源神话与古代朝中文化关系》(《求索》1996年第3期)、赵杨《韩国和朝鲜神话研究之比较》(《东疆学刊》2005年第3期)、赵杨《熊女神话母题在韩国文学作品中的复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苑利《韩民族熊图腾文化来源考》(《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李晶《满通古斯民族与朝鲜民族神话传说之比较》(《延边大学学报》2004年第2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期)、张春海《试论“朝鲜”和“阿斯达”的含义及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许辉勋《试论朝鲜神话所表现的原初宇宙观》(《延边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宇汝松《试论檀君神话与道教的基本文化精神》(《中国道教》2004年第2期)、王志国《檀君神话和弘益人间思想》(《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等文章,都把檀君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探讨。

箕氏朝鲜是商朝遗民箕子建立的政权,箕子及其所建政权也是学术界持续讨论的问题。闫素芬《箕子与箕子朝鲜》(《沧桑》2012年第1期)对箕子及其一生作了一个全面的解读。陈蒲清《箕子开发古朝鲜考》(《求索》2003年第1期)从古代中国史书的记载、古代朝鲜史书的记载、考古发现与民俗的证明、后代历史往前推断四个方面对箕子开发古朝鲜的问题进行了考证。张碧波、喻权中《朝鲜箕氏考》(《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6期)对朝鲜名称的由来、箕氏朝鲜的地望、箕子其人以及箕子朝鲜诸问题进行了考证。李德山《关于古朝鲜几个问题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2期)对古朝鲜的名称、“八条之教”、古朝鲜与中央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驳正了有关的歪曲观点和不实之论,并对古朝鲜之于中华民族所作的历史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杨军《箕子与古朝鲜》(《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3期)认为,箕子在周武王灭商之前,就已经到了朝鲜半岛,建立了国家。对于箕子为什么要去朝鲜,该作者认为商人在东北仍然保持着较雄厚的实力,因此这里是箕子最理想的选择。该作者还认为,箕子在十三祀来朝,周武王在管地会见箕子;箕子是先到辽西,然后才东迁朝鲜半岛的;“朝鲜”是地名,而非国号。随后张碧波发表了辩驳文章,即《关于箕子与古朝鲜几个问题的思考——与杨军先生商榷》(《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3期)。紧接着,杨军又写《再论古朝鲜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答张碧波先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6期)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对于周武王会见箕子的地点,张博泉、魏存成《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认为二人见面地点不在成周,而在管地。其实,对于周武王会见箕子于管地的问题,古书记载得已经很清楚了。现在有些学者不翻检古籍,硬是凭空地发表议论,是不严谨的。杨军《公元前朝鲜半岛的民族迁徙与融合》(《东北亚论坛》2002年第3期)从中国古籍入手,对公元前朝鲜半岛上的民族迁徙与融合情况作了分析,认为朝鲜半岛最古老的土著居民是鸟夷;约公元前11世纪,殷商移民迁入大同江流域,与当地民族进行融合,形成良夷;半岛其他地区的夷人发展成为秽

人；自西周中后期开始，生活在北方蒙古草原上的貊系部族逐渐向东、南迁徙，一支进入朝鲜半岛，与当地的秽人融合形成马韩；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末，中国人大量迁居朝鲜半岛，移民最多的是在大同江流域、汉江流域；公元前1世纪中后期，夫余人东迁、南下，其中一部分进入朝鲜半岛南部，使这里形成了新的民族格局。张方和《箕子与朝鲜半岛》（《中州古今》2000年第2期）对箕子在朝鲜半岛创立姓氏、开垦荒地、教民礼仪和法治等方面作了探讨。张碧波《古朝鲜文化探源》（《北方论丛》2000年第1期）从文化的角度对古朝鲜进行了探讨，认为古朝鲜文化有三个来源：一是中华古老的汤谷扶桑十日神话；二是颛顼高阳族团文化；三是殷商文化。顾铭学、南昌龙《战国时期燕朝关系的再探讨》（《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1期）对燕国与古朝鲜的和平交涉、燕朝的疆界问题、燕国对古朝鲜的领土扩张三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张京华《箕子朝鲜时期的北方环境》（2001年上海“第四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认为箕子朝鲜的历史是可信的，提出了三点理由：第一，两国“玄鸟生商”传说与卵生传说可以从理性角度给予合理的解释。第二，有学者提出朝鲜韩国的卵生传说是根据其他民族的起源传说编成的。但是，各民族在祖先起源方面并无编造的例证，在中国，夏商周三代的祖先起源传说就完全不同。如果有些民族的祖先起源传说有相似的现象，则是因为其具有相近的血缘关系。第三，有学者提出“玄鸟生商”与卵生传说是伪造历史，然而这些传说早在汉代就出现了，学者已基本不懂其真实含义，而人们对于自己不懂的事情是不能够伪造的。孙卫国《传说、历史与认同：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之塑造与演变》（《复旦学报》2008年第5期）认为，朝鲜半岛对其古代根基历史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漫长过程。自朝鲜王朝以来，其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极力推崇箕子，到独尊檀君朝鲜。当下意识与认同是决定这种变化的关键。朝鲜王朝作为明朝的藩国，处于中华世界体系之中，箕子作为来自中原王朝的教化之君，将朝鲜提升到“小中华”的地位，是朝鲜实现“由夷入华”的关键人物，因而受到极度尊崇，与此同时，檀君则处于被贬斥的地位。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与日本殖民势力的侵入，中华世界体系的解体，大韩民族国家的形成，箕子被抛弃，檀君作为民族祖先的地位得以确立并被强化，成为韩国加强民族凝聚力的灵魂。因而，现实需求与民族认同是研究韩国根基历史塑造的一个重要视角。

对于箕子和周朝的关系问题，自古到今一直争论不断。从历史记载来看，对周武王分封箕子之事似乎没有异议，如《潜夫论》、《后汉书》、《尚书》、两《唐书》、《通志》、《通典》、《太平寰宇记》等古籍，都认为分封一事真

实存在。关键问题是箕子是否接受了周武王的分封。对此，中国学术界多认为箕子接受了分封。但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封而不受可能比较接近于历史事实，《汉上易传》、《书传》、《尚书疑义》等古代史书都认为箕子“师而不臣”。明代经学家马明衡甚至否认周武王曾经分封过箕子。

箕子朝鲜历史缺乏完整性的问题，也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在关于它的历史记载中，只有三位国王有名有姓，即箕子、第四十代孙否、末代王准，中间缺乏世系。一些学者借此否定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箕氏朝鲜。这给箕氏朝鲜的相关研究带来了莫大的困扰。先秦史学家王彩梅在其专著《燕国简史》中认为，“燕国的历史虽然很悠久，但是它的早期情况，在文献中确保存得很少”。燕国历史记载保存很少，遑论箕氏朝鲜。黄历鸿、吴晋生《“箕子朝鲜”钩沉》（《北方文物》2001年第3期）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古朝鲜世系不全的问题给予了说明，是很有说服力的，文中认为作于西周时期的《逸周书·箕子解》可能在秦代以前就已佚亡，故没有留下关于箕子后代的记录。

箕氏朝鲜的疆域也是学术界讨论比较激烈的论题。首先对于其最初统治中心的问题，就产生了分歧。一派认为最初在辽东的大凌河流域，遭遇燕国打击后才转移到了今平壤地区。阎海先生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在其作《箕子东走朝鲜探因》（《北方文物》2001年第2期）中就表达了这一观点。张博泉《箕子与朝鲜研究的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3期）甚至认为箕氏朝鲜最初的活动中心在辽西。都兴智《关于古朝鲜研究的几个问题》（《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肯定了箕子在朝鲜半岛建立政权的事实，而且认为箕氏朝鲜的疆域范围到了辽东和辽西。另一派则认为，箕氏朝鲜的活动中心最初在大同江地区，这一论点的最早提出者为东北史著名专家金毓黻，他在专著《东北通史》（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版）中具体表达了这一观点。张碧波也支持金毓黻的观点，在其作《关于箕子东走朝鲜问题的论争》（《北方文物》2002年第4期）中从文献和考古两个方面驳斥了“箕氏朝鲜在辽西说”，认为其一开始就在辽东。同作者《关于箕子东走朝鲜问题的论争——与阎海先生商榷》（《北方文物》2002年第4期）就阎海的观点进行了辩驳，一驳箕子朝鲜“辽西说”，二驳箕子朝鲜为“殷商王朝余脉说”，认为半岛为古之辰国，曾经是殷商先王开辟的海外属地。刘子敏《也谈古朝鲜的几个问题——与都兴智先生商榷》（《史学集刊》2005年第4期）对都先生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即否认箕氏朝鲜的范围曾经到达辽东、辽西地区。李健才《公元前3—公元前2世纪古朝鲜西部边界的探讨》（《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5期）对古朝鲜的西部边界作了探讨，认为古朝鲜在

辽东即今辽宁说并无可靠的根据，古朝鲜的活动中心在今辽河下游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平壤应该是古朝鲜的活动中心。同作者《关于汉代辽东、乐浪两郡地理位置问题的探讨》（《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对汉四郡以前辽东郡和乐浪郡的地理位置进行了讨论。文中认为，辽东郡在今辽河以东到今朝鲜的清川江一带，郡治在今辽阳市；乐浪郡在今朝鲜的大同江流域，郡治在今朝鲜的平壤。山川形便和犬牙交错是古代政区划分的两个特点，其中“山川形便”是疆界的最大特点。疆域往往是通过一些自然的大山或大河作为两国界限的，“因河为塞”即为这个意思。当然一些人工屏障也往往被作为疆域界限，如中国秦长城、汉长城、明长城和朝鲜半岛的大宁江长城等。但由于朝鲜半岛和中原相隔甚远，中间又隔着许多少数民族政权或势力，故中原对其了解甚少，以至于对半岛河流的记载相当混乱，张冠李戴现象非常普遍，这给我们研究疆域问题带来了很大困难。学术界对此也是争论不已，分歧很大，莫衷一是。对于洩水、列水和满潘汗到底是今天的哪条河，学术界也争论不休。韩国学者李丙焄先生认为大同江在汉代是列水，而不是洩水（转引自顾铭学、南昌龙《战国时期燕朝关系的再探讨》，《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1期）。张碧波、喻权中《汉四郡考释》（《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1期）认为列水就是今天的载宁江。朝鲜学者韩百谦在《东国地理志》中认为清川江当为洩水，完全符合《朝鲜传》的有关记载，又与《汉志》对洩水的描述不矛盾，是最合适的解释。当然在未有考古发现以前，清川江说终非定论。顾铭学、南昌龙《战国时期燕朝关系的再探讨》（《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1期）认为，满潘汗很可能来自三条水的水名，即汶水、沛水、汗水。汶水为今朝鲜平安北道的昌城江，沛水为今大宁江，汗水则为洩水。这其实是一种很模糊的说法，不可取。刘子敏《高句丽故地沿革考》（《通化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认为以大宁江长城为地理坐标，完全可以肯定此洩水即今清川江。顾铭学、南昌龙认为列水为今之大同江，甚至武断地说：“除有意不承认者外，中外学者莫不首肯。”张博泉《箕子与朝鲜研究的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3期）认为满潘汗为今鸭绿江。李德山赞同张博泉的观点，并在其作《关于古朝鲜几个问题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2期）中说满潘汗在今鸭绿江下游南岸一带。著名的魏晋史专家逯耀东先生在其《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中华书局2006年版）中说，洩水即今之鸭绿江。李健才《评辽水、洩水、列水均指今滦河说》（《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年第3期）根据文献与考古资料，指出“辽水、洩水、列水均指今滦河说”的错误，认为辽水并无汉武